

女权主义与文学



康正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文学研究参考丛书 ·

女权主义与文学

康正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030号

责任编辑：万小器

责任校对：王应来

封面设计：朱虹

版式设计：王丹丹

女权主义与文学

NUQUANZHUYI YU WENXUE

康正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编码 100720 电话 4415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遵化市印刷厂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2插页 106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册

ISBN 7-5004-1241-X/I·128 定价：7.00元

内 容 提 要

作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方面的一本入门性的专著，本书在不大的篇幅中，深入浅出地将这一纷繁复杂而又玄奥晦涩的理论之轮廓勾勒得清清楚楚，并且着重归纳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策略和主张，那就是抨击和解构男性中心文学，弘扬和发展女性文本，用女性视角和价值重新审视和解释一切文学现象，从而为文学创作和研究开启一个新的话语空间。在这个基础上，作者作出了公允适度的评价和妥贴审慎的分析，使得读者既看到了女权主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也认清了其中难以避免的激进和偏执。

出版说明

《文学研究参考丛书》旨在满足文学研究工作者、文学教学工作者和高层次的文学读者的需求，为新时期蓬勃发展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提供重要的参考。

本丛书将从当前文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角度着眼，编选那些在思潮、流派、观念、方法诸方面卓有代表性的外国文学名著和文化文学论著，以及与此有关的参考读物，兼收反映国内某些值得关注的文学趋向的文学作品或文论著作。

丛书中所收入的著述所代表的倾向或观点，不尽是我们所欣赏、所赞同的。著述中在“前言”或“后记”中表述的编者或译者的看法，也望作为一家之言看待。总之，读者应当本着“有分析有批判”的态度，去接受和领会本丛书所提供的一切信息和知识。

序 言

万 千

20世纪最具破坏力和蛊惑力的理论，莫过于女权主义了，它起源于妇女主张男女平等的政治要求。这种原本合理的政治要求，因女性的自恋乃至仇视男性的文化态度，并进而在语言领域中畸形地膨胀和衍生，逐渐形成了一种颠覆性极强的、近乎咒语般的理论思潮。

作为解构主义的一个变种的女权主义理论，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其要求男女平等的政治初衷，而企图通过揭示人类文明中的父权制的本质，强烈要求打破现存的两性秩序，重新确立女性的地位和角色，最终达到消解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目的。

对于女权主义理论，笔者也曾接触过几本代表性的著作，对其晦涩玄奥和纷繁复杂，我是深有体会的。如今读到康正果先生的这本专门评介女权主义的小书，并惊喜地发现他能在不大的篇幅中，将这一令人望而生畏的现代理论的轮廓勾勒得清清楚楚，并在结合古今中外的文学实例的基础上，深入浅出、要言不烦地传达出了其中的要义。这显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同时也说明作者在学术策略上的选择之明智和现实。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并欢迎占有材料更多、学术层次更高的有关女权主义的宏篇巨制的问世，但在现阶段，在大多数读者对女权主义还不甚了了的状况下，像康正果先

生这样的微言大义的导引性读物，同样具有它的意义和价值。

如果说我对作者的学术策略表示认同的话，那么对他在评价和理解女权主义过程中的理论思维则更表赞赏。

毫无疑问，女权主义理论和批评在有限的语言领域和理论范围内，确实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父权制所确立的象征秩序，但它充其量也不过是改变了专业性的思维方式，拓展了理论批评的话语空间而已。至于女权主义者所期待的政治和文化上的革命则远未因此结出实际的果实。充满着偏执和激进色彩的女权主义总是难免陷入理论和文化的乌托邦，在现实面前总是捉襟见肘、似是而非。事实上，男性代码依然浸透着强权，在现实社会里横行无阻。面对这一尴尬的理论僵局，康正果表现出了他的成熟和深刻。他指出：

女权主义者与国内热心编造农民起义史神话的人们有着类似的症结：他们都喜欢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绝对对立起来，把压迫的制度理解成一个必须爆破的碉堡。正如农民不满封建统治者，又与后者共谋一样，“女人”本身就是父权制的产物，她承受着压迫，又寄生于其中。正如农民的阶级仇恨并没有对封建制度构成真正的威胁，妇女从来也没有仅仅凭着女性愤怒得到真正的觉醒。必须把妇女的解放和觉醒置于整个的历史、社会变革中考虑。

作者的这种历史主义的理论思维，使他的评价颇为中肯，颇具说服力。类似这样的论断，在小小的篇幅中随处可见，特

别是全书结尾部分关于两性之间将出现新的融合的观点实在值得玩味和深思。

以上这些文字，是我对女权主义和康正果先生的这本关于女权主义的小书的理解和看法，现在把它们放在卷首，聊当序言，也算不辜负正果先生对我的信任和嘱托。

1993年7月15日

自序

女权主义者向来不太欢迎男人谈论女权主义的问题，而男人也很少自发地思考和关心此类问题，因为他们毕竟与妇女有很大的差异，他们自身的处境和经历并不足以使他们迫切地感到有这种必要。

记得那还是在1987年初，当时我正准备写一本有关古典诗词与女性的书，由于厌弃妇女诗词研究中的陈词滥调，而又苦于找不到新的方法，便盲目拿起一册厚得象块砖头的《第二性》英译本啃了起来。读后大受启发，接着又读了一些更新的东西，从此便入了女权主义批评的门。那些新颖的角度和对立的立场的确使我想到了许多从前读文学作品时很少或根本没有考虑过的东西，我已把这些想法写在《风骚与艳情》一书中了。

近几年来，国内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介绍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文章，其中有很多作者对待女权主义批评的态度似乎与时下大量介绍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的态度基本相同。也就是说，介绍者更关心借鉴新方法，而这种求新猎奇的眼光，拿来主义的意图，往往使他们忽视了女权主义批评坚持性别分析的中心原则。我自己也是抱着借鉴新方法的目的涉猎女权主义批评的论著的，但后来终于从自己的批评实践中领悟到，女权主义批评并不提供一种可以“引

进”的中性方法，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其方法和理论的选择始终与女权主义的政治批判联系在一起。企图孤立地借鉴它的方法，几乎是买椟还珠的事情。

因此，我觉得，应该比较全面而深入地介绍女权主义批评的理论和实践。起初打算与几位友人合编一本女权主义批评译文集，但在自己亲手译了几篇文章之后才发觉，对于广大的普通读者，编译文集是个事倍功半，吃力而不讨好的事情。一则由于译文或选自专著的一个片断，或专门论述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某一专题，大都牵一发而动全局，在不了解女权主义批评总体背景的情况下，直接读这些译文，大有令人如堕五里雾中之感。作为一个译者，连我自己在读自己的译文时也颇感半通不通，似懂非懂。二则由于这些文章满篇的新术语，新概念，不放在女权主义的“上下文”中详加解释，充分阐发，一般读者很难吃透，勉强译之，难免似是而非，译了几乎等于没译。三则由于女权主义批评涉及的作者与作品对于大多数读者都很陌生。若对批评的对象缺乏起码的了解，便想从关于它的批评实践中学到可资借鉴的方法，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四则由于女权主义批评兴起于六十年代末，它与当时及其后盛行欧美的其他现代批评有着较为复杂的关系，若对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等批评理论缺乏了解，读起女权主义批评的文章自然会碰到不少困难。如果说以上四重障碍对专攻文学理论和精通西方文学的人并不存在的话，他们自然可以直面原著，无须有限的译文集提供零敲碎打的东西。而对一般读者来说，更为迫切的应该是提供一本概述女权主义批评理论的入门读物。这就是我写这本小册子的缘由。虽然本书以提供有关女权主义批评的知识为

主，但由于它与学院派的知识旨趣不同，所以很少理会理论家唠叨的纯学术问题，而对普通人在写作和阅读中体验到的事情倒有一些十分贴近的分析。

必须声明的是，本书的内容极大地受到了手头资料的局限。虽说女权主义批评最重要的论著我已读了一些，但在今日女权、女性之书多如牛毛的西方，我所读者不啻九牛之一毛。必待尽收其书，博采精选而后动笔，无论是时间或精力都是不允许的。我不想贪大求全，仅以勾勒轮廓，传达妙义为主。因此，所谓全面介绍，其实仍以我个人所理解的、我以为国内读者能够接受和需要了解的东西为重点。没有解释就没有真实，没有理解也无所谓真义。在这本介绍性质的书中，我尽量争取贯穿以述为作的精神。

女权主义者素喜在行文中声称“我们”或“我们的”，其用意在于把支配群体排除于妇女群体之外。因此，书中凡提到女权主义者时，一律以“她们”或“她们的”称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是站在局外或对立的立场上发言的，我始终认为凡与妇女相关的问题都与男人有关，因而在评介她们的言论时，我并没有忘记我在介入与“我”相关的争论中。

本书所依据的英文资料大部分是李小江、黎慧、叶舒宪和萧瑗四位友人提供的，没有他们的无私帮助，我对女权主义批评的知识只可能是一知半解。此外，在本书属草之际，我还参考和部分引用了郑州大学杨玮斌和吕伟民所译三篇女权主义批评的未发表译稿；西安交大的胡芸为我誊写了全部书稿，在此，我仅向他们表示由衷的谢意。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日

于西安交大

目 录

序 言	万 千	(1)
自 序		(1)
导 论	什么是女权主义.....		(1)
第一章	性政治和文学.....		(14)
第二章	厌女症和理想化.....		(40)
第三章	菲勒斯批评和妇女写作的困境.....		(64)
第四章	女性批评的探索和争论.....		(84)
第五章	边缘的边缘.....		(109)
第六章	语言中的女人.....		(130)

导 论

————— 什么是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首先起于改变妇女现存生活状况的愿望和要求，它与各种变革现实的革命和行动都有一定的联系，但它又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它号召妇女在尚未完全实现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因此，除了介入各种女权运动，为消除各种歧视妇女的制度和现象而斗争以外，女权主义者同时还从事着文化大批判的活动，她们试图通过分析妇女的从属地位形成的原因，提高妇女对自身和现实的认识，把她们首先从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女权主义者认为，在妇女应该做什么和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上，文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只要扭转了社会的态度，角色和身分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由此可见，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有着非常相似的出发点，两者都相信，人一旦从有关自身和现实的幻想中清醒过来，掌握了真理的武器，就能产生解放自己的力量。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是“我们必须怀疑一切”，女权主义者也具有同样的怀疑精神，凡是她们认为有利于男人的常识和成见，凡是代表了男性价值的事物，在她们眼中都是可疑的。她们毫不隐瞒地承认，正因为现存的性别体系把妇女贬抑到从属的地位，使她们一直处在不能充分发挥自身潜

能的状况，所以女权运动才必须以性别路线为基本的出发点。正如美国的种族歧视使黑人天然地形成了对抗的群体，或如左派学生的造反把一切权威当作共同的靶子，女权主义者首先把全体妇女假定为统一的受支配的群体，并将其与男性的群体对立起来。

必须指出，这种对立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者内部铁板一块，由于所从属的阶级、种族、地域和所倡导的理论、方法各不相同，在同一个女权主义的旗下，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女权主义。同时这种对立也不意味着女权主义者把每一个具体的男性视同敌人。这主要是一种文化上的对立，它提倡用一种特殊的女性视角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现象，并进而重新审视现存知识领域内各种定论的可靠性。它不但揭示我们的学术研究对妇女问题的忽视，重新发现和评价妇女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力图树立女性视角的地位，最终改变男性中心文化支配一切的局面，形成一种新的、与之抗衡的女性文化。从今日的趋势看，女权主义的挑战和影响已在现代西方的多元文化中发挥出渗透性的活力，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女平等。

不可否认，随着妇女文化水平的提高，以及政治和经济地位的改善，无论是在西方的发达国家中，还是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妇女在很多方面已赢得了与男子平等的待遇。但女权主义者对这一切可喜的现象并不抱多么乐观的态度，因为她们非常失望地发现，种种表明了男女平等的表面现象不仅与妇女的真实处境差异甚大，而且还掩盖和粉饰了事实的真相。女权主义者的工作首先便从揭示真相开始。她们指出，在妇女已充分就业的表面现象下掩盖着她们大都从

事低等工作的现实；妇女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公民权利，但社会上的一切大权仍操在男人手中；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显著地提高了，但照看孩子和做家务的重担仍压在她们的身上。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至今仍处于从属的地位。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很大，尽管生活在不同制度下的妇女各有其特殊的问题，但在女权主义者看来，就所有的妇女大体上仍受男性群体支配的事实而言，今日的世界本质上都是父权制的。按照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诗人阿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的解释：

父权就是父亲的权力，父权制指一种家庭—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来决定妇女应起什么作用，同时把女性处处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或幽居深闺，或驾驶载重汽车，或在北非的农舍里服侍丈夫喝早餐的咖啡，或行进在美国大学生的队列中，我们处处都处于父权制的控制之下；不管我的身分、处境、经济地位或性偏爱如何，我都生活在父权之下，只有在我为赢得男性的许可而付出代价时，我才能在父权制的许可下享有特权，发挥影响。①

里奇的描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男女平等的中国很少有人想到的问题，即在社会制度和习俗不同的国家中，妇女的

① A·里奇：《生来是女人》，转引自H·艾森斯坦《当代女权主义思想》（伦敦，1985年），第5页。

外境本质上是相同的：她们都面对着父权制的压抑。按照女权主义的宗旨，妇女不只应积极参加反种族歧视、反极权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她们还应把所有的政治斗争纳入反父权制的总方向。正是点出了父权制这个共同的靶子，女权主义者超出了种族、阶级和社会制度的分割，建立了以妇女为本体的统一阵线，并把通行的观念和习俗统统作为值得怀疑的男性价值体系。这种性别路线不仅是女权主义的组织原则，而且是把每一个妇女从家庭和与男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号召，是促使妇女形成社会群体的姊妹情谊。里奇甚至引伸和扩大了同性恋的含义，用“同性恋的绵延”（lesbian continuum）来描述自古以来就在妇女群中天然形成的认同感。她认为“同性恋的绵延”这一用语可以泛指“妇女共有的经验”，它贯串了每一个女人的生活和整个历史；它并不仅仅指一个女人与另一个女人曾有过或想发生性关系这样的事实。如果把它扩大到包括女人之间很多重要的内心经验的形式，把共享一种丰富的内心生活，结成反男性暴戾的同盟，以及给予和接受政治的和实际的支持全包括在内……我们就触及到女性的历史和心理，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了对‘同性恋’通常所作的临床意义上的有限界定了。”^①显而易见，里奇的广义同性恋已经超出了提倡男女平等的初级要求，她更为关注的是女性的特殊性和主要性，她要求女权主义的文化批判首先把性别作为构成经验的基本范畴。

从性别路线出发，女权主义者试图从被埋没的女性史中找出女性文化的根，正如黑人搜集他们的家史，无产阶级把

^① A·里奇：《强制性的异性恋和同性恋的存在》，载《妇女、性别和学术》（“标志”选丛，芝加哥，1983年），第156—157页。

071854

阶级斗争的上源推到了古代的奴隶起义。例如，有人就把女权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女诗人萨福。萨福出生于米蒂利尼城的贵族家庭，据说她在该城建立了名扬希腊的女子学府。她的学生都是能歌善舞的少女，她们结为伴侣，在一起吟诗，唱歌，弹琴，跳舞，并专门演唱婚歌，为城中人家的婚礼助兴。希腊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斯巴达，女性之爱是相当高贵的，即使是最可敬的妇人也会迷恋上少女。”这说明“少女之爱”在古代希腊甚为风行。萨福写了很多歌颂“少女之爱”的诗篇，特别是在写给阿提斯和安托利亚两个女伴的情诗中，其缠绵热烈之情的确表现了拜伦所谓“如火焰一样炽热的萨福”。也许由于上述的原因，很久以来就传说萨福是个同性恋者。由于萨福住在累斯博斯岛（Lesbos）上，希腊人又把女同性恋称之为“累斯博斯之爱”（lesbianism），称女同性恋者为“累斯宾”（lesbian），两词的这一含义至今仍为西文所延用。就里奇的广义同性恋理论来看，Lesbianism和lesbian在女权主义的“上下文”中已不只限于一种异常性关系的名称，而是常常标志着女性的立场和路线，是在强调女性的文化认同。因此，在以下涉及到女权主义意义上的同性恋时，我们将适当地采用含义更宽泛的音译，把前者叫“累斯宾主义”，把后者叫“累斯宾”。不管是一般的同性恋关系，还是里奇所强调的累斯宾主义，这种凝聚姊妹情谊的传统显然与中国的妇女史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在谈到现代西方各种文化新潮时，我们往往把眼光局限在导致其兴起的现实因素之上，其实西方社会中很多新生事物都不是突然涌现的，它们都经历了一个缓慢变化的漫长过程，其根基往往深埋在某些表面